



一次次去北京，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担任嘉宾:先是《加油!向未来》，接着是《谢谢了，我的家》，最近则是《开讲啦》。

我原本是《开讲啦》的热心观众。这是一档在央视一频道播出的节目，每周六10:30开始，长达一小时。晚上，我很少看电视剧。结束写作临睡之前，喜欢打开电视机随意看一些时政类或者访谈类节目，《开讲啦》恰恰在这一时段闯进我的眼帘。

《开讲啦》的定位是“青年电视公开课”，课题林林总总。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转向邀请科学家、学者等知识精英主讲，连我这老头儿也爱观看。在我看来，这些讲课者都是方方面面的顶级专家，虽然有些课题有点“高冷”之感，却是很好的“充电”机会。比如，密码学、量子通信、高铁设计、深海探索……这些前沿的新鲜知识，是当年在大学里没有学的，所以我赶紧趁机“补课”。

未曾想到，《开讲啦》编导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来电请我去讲“文化的力量”系列第一课。他们事先网购了我写的书，细细看过，才确定我为讲课人。我答应了。两位编导从北京来到我家，一起理清讲课的思路，写出大纲，然后前往北京录制。

央视这些节目不在中央电视台大楼里拍摄，而是租用北京各处的摄影棚。比如《加油!向未来》里有爆炸、燃烧之类危险性实验，就租借远离北京市区的蟹岛度假村摄影棚，而《开讲啦》则是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摄影棚拍摄。录制之前，编导带我走

亲历“开讲啦”

叶永烈

进摄影棚，熟悉一下环境。《开讲啦》的布景宏大，相当气派，前方是一个硕大的钢化玻璃圆台，四周是众星拱月状的阶梯形四五百个座椅。编导告诉我，明天下午录完节目之后，所有的布景将全部拆除，转移到仓库里存放，腾空现场，后天这里将是另一节目全新的布景。摄影棚的租金不菲，所以摄制组必须快进快撤。他们每月播出四集，往往集中在两天内录完。我不由得想起，录《谢谢了，我的家》的时候，主持人敬一丹一天要录六场。她的节目每位嘉宾通常要录将近一小时，而经过剪辑之后的播出时间是

一刻钟，《开讲啦》每位嘉宾录制时间为两个半小时，播出时间则为一小时。面对经历完全不同的嘉宾，主持人事先必须做诸多过细的准备。别看主持人在现场生龙活虎，其实他们高强度的工作非常累，有时中午休息时要吸纯氧，以便尽快恢复体力。

《开讲啦》的主持人是撒贝宁。在《加油!向未来》节目中，跟他有过合作，所以这次一见面就很熟悉。我原本以为小撒是“理工男”，所以他在节目中跟许多院士、专家交流时，仿佛像半个内行似的，今天说探月工程，明天谈水利科学，他都能搭话。谁知他竟然出自北京大学法学院。靠着强记博闻，他居然能够在节目中跟各种专家对话游刃有余。小撒表情丰富，出语幽默，还不时冷不丁插上一段小掌故，使原本相当严肃的讲座活跃起来，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开讲啦》开头的暖场和结尾时答观众问，有小撒跟我对话，算是“对口相声”，一捧一逗，应答自如。中间是大段讲课，要一个人站在圆台中央长篇大论，如同“单口相声”。我手中没有讲稿，一口气有条不紊地讲下来，有点吃力。尤其是讲课要尽量生动有趣。观众都是从网上报名而来的年轻人，倒是很给力，聚精会神听讲，不时发出笑声、掌声，使现场气氛变得很热烈。摄制组为我准备了椅子，而我坚持站着讲。当我结束录像，从圆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膝盖因站久了都有点僵硬了。

在剪辑的过程中，编导与我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认真工作态度，令我难忘。比如讲课结尾时要回答观众五花八门的提问，往往随口而答。有位观众问及我的小说《腐蚀》的写作背景。我说，这是1980年盛夏我前往新疆罗布泊参加搜索科学家彭加木，被他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以他为原型写出的。我凭记忆说，彭加木是7月16日失踪的。编导们经过查对，发现我的记忆有误，来电向我核实，在播出时把字幕改写为“1980年6月17日失踪”，避免了错误。幕后工作，容易被忽视，但不该被遗忘。

夜光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父亲陈伯吹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由于上海的冬天没有暖气，每年冬天父母都要到北京来过冬。父亲的行李箱里有一半都是信件，这些信件是他在上海时来不及回复的，也是他到北京后要做的

工作。

父亲对于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十分认真，这是他从从事教师、编辑、作家工作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来信是小学生、中小学教师，还是作者或出版行业的领导，他都热情洋溢地回信，从不敷衍。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半工半读，兼职做幼儿教师

的师范的教师，同时应北新书局的邀请担任《小学生》半月刊的主编开始，六十六年中，他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估计有数千封之多，由于年代的久远，很多信件都已经无从查找。此次由年轻的宝山同乡、散文作家唐吉慧先生多方搜集，汇集在这本书里的信件有150多封。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有中学生、家长、教师、业余作者、著名作家、出版社同事、作协领导等等。收录信件的写信时间从1945年到1996年，其中有1949年至1951年致常君实的毛笔信五封，十分珍贵。每一封信件都可

失地

陆岸

对于共同生活的矛盾，钱兄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领地入侵。他说今年夏天和女友露露有一个月天天在一起，到后期，“有很明显的领地被侵入的感觉。”现在露露回中国，钱兄“晚上十点把电脑关掉，手机闹钟设好就不去动了，在床上看半个多小时的kindle，睡下去特别稳。”

我说：“你的私人领地独立王国重建得挺好嘛！”恰好那两天，妻子去斯特拉斯堡见老同学，我也暂时“收复”了一把“失地”。

今早睁开眼，钱兄发来消息：“我最近睡前用kindle看鲁迅的书，感觉鲁迅有时有点冷面滑稽的感觉，挺可爱的。”睡前读书也是我的习惯，不过现在“没条件了”。一方面是身处陋室——双人床是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没有台灯，没有摆台灯的床头柜，因为连床头也没有；我又只看纸质书，不肯用自动发光的kindle。另一方面，我不再是单身汉，总不能白天看书，晚上也看书。

“估计这辈子就像宋代，山河破碎了。”我对钱兄说。又想到妻子姓胡，于是想到那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当然，陆秀夫是不降的，最后抱着小皇帝，跳进了海里。

（作者为上海浦东新区人，现居上海）

尺素寸心

陈佳洱

以有一个故事，特别是一封给我父亲终生的朋友，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才先生的。父亲和李楚才先生的友谊真挚又深厚，他本人是教师出身，他喜欢交教师朋友。1972年他从上海郊区奉贤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不久，就和李楚才先生延续了友谊，每周六晚饭后，他慢慢地步行到李楚才先生家，两位老朋友便开始了友谊的交流。

写于1948年4月17日的信件，是给为《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投稿的业余作者张启钰的。张启钰那时正在英国接受水兵培训，他给《现代儿童》寄稿件，介绍英国小朋友和大朋友给《现代儿童》写信，介绍英国儿童和水兵的生活，并寄来200多张画片和明信片。张启钰回国后是“重庆号”上的水兵，我父亲曾写信给他，劝他“良禽择木而栖”，意思是要他脱离国民党军队，选择到人民一边。张启钰后来参加了“重庆号”的起义，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27名成

员之一。

对孩子的爱贯穿于父亲的一生之中，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回复一位初中学生周彦菁的，小读者在来信中倾诉了对升学问题的苦恼，父亲写了一封1400字的信，如同一位教师殷谆谆诱导，鼓励他“挺起胸膛，正视前方”，“迎上前去，思索它，分析它”，并引用了古贤邵康节先生说过的话：“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要周彦菁同学好好安排时间，锻炼身体和毅力，勇往直前，取得进步。

另外，父亲也曾给1981年获得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比赛金质奖章的赵爽同学写过十几封信，鼓励她在文学上继续努力，争取做一名儿童文学作家，这次吉慧通过《中国新闻周刊》社黄卫得到了赵爽通讯方式，并联系到了已经定居德国二十多年的赵爽，可惜由于数次搬家，信没有被保存下来。

感谢唐吉慧先生做了那么好的工作，让我们能看到父亲七十余年写作生涯中工作轨迹的一生，这些信件对于研究父亲的一瞥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以此书信集为开端，相信会有更多的书信被发现、被研究。



中秋过后，棉花地便开始静悄悄，其实又是呜呜吼吼地白起来。吸蓄了一夏天光热的棉桃儿们，此刻开始争相吐露心絮——这絮儿把夏日的强烈和严酷褪滤了去，留下的尽是白软与轻暖。老家的人们忙了一年、累了一年，终于等到拾花了。

在此之前，立秋前后，往往也已看得见零星开放的花白了，但那只是棉株最下面的那一层老桃子。人们看见先开的白朵时，并不急着拾。第一批花虽然可谓功高，但往往不能尽美，大概正在于它们的先驱角色吧——它们有助于整株棉花最初的扎根稳定，但也让后来者“居上”，不仅在地力的攫取上，也更在阳光的获得上。最好的白朵确乎往往出于较上层的花枝。棉株并不会一直长个子，人们在适合的时候，一般是入伏后不久，便掐了主干的花心，有意指示它们“现在是长棉桃的时候了”。这一举措立竿见影，棉桃们，尤其是后来坐成的那些果实最为受益，它们意气风发，一鼓作气，在最炎酷的日子里，享尽晴明热烈，终于出落成不孚厚望的桃果。

开得最好的棉花，是那种与果萼若即若离、几乎要“淌泻”下来的白朵子。人的手，不需“抓”，只是轻抚上去，四瓣或者五瓣的白花便已自动入握了。也不是瓣吧，果萼原分瓣，白朵则已无分明的划线，它们蓬松松的，舒展展的，把既白且洁的花絮儿开成了一体，像共同裹着一团暖和儿。棉花素有“一生花开两次”的奇喻，确实的，在夏日鲜花曾经开放的原处，到秋阳下的此刻，白朵重绽。而且，白朵开起来的速度是那么快，让人直想到“荼”的气势，或者，“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的千树万树那般图景才更能比拟。人们年年如此应对，因此对它们的脾性也有准备，但见花地有了星星之亮时，便可以整装待“拾”了。花地一片一片片次第地放白，白了暗，暗了又白，反反复复，连绵月余，直到最后的星星点点也寂了眼，唯余遍野的苍黄——这是整株枝干的颜色，也寂了交付了所有的白的果萼，此时已有另一个更加传神的名字，花落儿。花落儿若蝶，依然美丽，而人们从这蝶群中最后走出之时，内心是踏实的收获之喜。

我也曾帮家人拾过花，刚上小学的时光，那时我们还放秋假。大人拾花用布包袱，缩成个口袋，束在腰间，先是像系了个围裙，等白朵子多得鼓起来，则又一个成了大腹便便的模样。我还用不了包袱，就用我的布书包。书包是母亲缝制的，单带斜挎，正好用来盛棉花。拾花的季节，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比在夏天干活不知要舒服多少了。但拾花仍然是累活儿，猫腰采拾，从早到晚，且负重前行，一点不比此前掐花心、劈花杈甚至喷农药的活儿轻松。可是，当人们的手一碰到它们那肉透透儿的、如婴孩脸蛋儿般的棉絮时，也就随之陶醉到喜悦里去了。

因此，我也最能理解今天“遍身纯棉者”的人们，经由“的确良”“莫代尔”等等漂泊之后重新回归纯棉，然后说“还是棉的体贴”，此时，我会想起遥远的天空下，拾花的季节里，手与朵朵白絮的亲切之握……

拾花季节

李志良



秋之韵

龚家坤 摄

七夕会

在这里养过一只六趾猫，起名“雪球”。他的小儿子抱着“雪球”拍的合影照片，就挂在故居的墙上。现在这些猫大都是“雪球”的后代。海明威为何偏爱六趾猫？据说六趾猫能给航海带来好运。海明威是位爱冒险的硬汉，出海、狩猎、看斗牛是家常便饭。

我也曾养过猫，猫是有灵性的，且通人性。我家的猫就非常粘人，跟我形影不离。而对海明威来说，或许猫咪的陪伴，也能带来文学创作的灵感吧。

基韦斯特小岛的灵气成就了海明威的写作。但他也许没想到，他离开多年后，自己养的猫仍一代接一代地在这座小岛上繁衍着，快乐地生活着，并成为故居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元素。

“法律规划师”

邓伟民

就像理财规划师、职业规划师一样，北京市西城区今年为辖区老年人推出“法律规划师”服务。老人在购买理财产品、给子女分配房产等事项之前，可以先向身边的法律规划师进行法律咨询，提前规避风险。

老年人非常需要得到法律保护。比如，老年人现在收入年年提高，消费能力不容小觑。于是，就有一些不法之徒把眼睛盯上了这些消费知识和法律知识都相对欠缺的群体。再者，涉及老年人的赡养、财产分配、遗嘱继承等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老年人亟需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在社区建立“法律规划师”制度，无疑是给老年朋友送来了及时雨和保护伞。其一，这属于提前介入，有什么問題可以第一时间咨询，可避免一些纠纷和侵权事件的发生，可谓防患于未然。其二，目前西城区已建成区、街道、社区三级法律援助体系，250多个社区都配有公益律师，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家门口就有专业的律师可以提供服务，真正体现了便民性与利民性。其三，享受服务的不但包括60岁以上的户籍居民，常住居民同样能得到服务，突破了过去法律援助的诸多条条框框。

总之，这个可贵的尝试是让法律走进千家万户的良举，值得借鉴与推广。

就像理

财规划师、

职业规划师

一样，北京

市西城区今



来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观海明威故居是我的愿望。儿子曾去过，所以给我当向导。由他驾车，我们从迈阿密出发，沿着一号公路，一直向南前往基韦斯特岛，全程160英里，经过四十多座桥。优美的海岸线和亚热带风光在微风中舒展着，漫漫长堤，海天的浩瀚与旖旎景象尽收眼底。

海明威故居在基韦斯特岛一号公路接近终端的白头街。不远处是茫茫大西洋岸边，站在街上就能见到有个圆锥形的地标性景观，这是美国本土最南端，距古巴仅90英里。故居白色和翠绿，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被葱郁的树林包围着。庭院内鲜花簇拥，草地碧绿如毯。小桥流水的池塘，美人蕉、芭蕉、凤尾竹以及其他阔叶植物与椰

旅游

树、棕榈树浑然一体。主体是一座二层白色小楼，木地板，房间宽敞明亮，拱门式造型，落地窗户。陈设的家具是海明威一家用过的原物。二楼展厅里，有两张海明威夫妇在抗战期间1941年来中国的老照片，分别是在第七战区韶关考察和在重庆的留影。通过这次中国之行，海明威预言：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不义之战注定要失败。战后，共产党将取得中国政权。事实证明海明威的预言是正确的。

走进二楼卧室，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床单、被子铺得整洁素雅。洁白的被罩上躺着两只白色的猫，眯着眼睛，蜷缩着身子正在睡觉。两个枕头之间，横卧着

一只黑猫，温顺可爱。后来发现，宅院随处有猫出入，书架上、沙发上也成为它们的领地。我们顺着一条小路，拐进一个小花园，路面由不规则的石板铺就，一块块石板上刻有英文和年号。我感觉到有些疑惑。儿子告诉我，这个小院是猫的墓地，每块石板就是一个墓碑，上面刻的是猫的名字和年龄。

花园另一侧靠近围墙的树木之间，搭有各式猫房，可谓档的高档别墅。蹲在草坪上的一只猫，跷着一条腿，歪着脑袋，伸出舌头正在舔脚掌的肉垫，我仔细瞧了瞧，竟有六个脚趾。再观察其他猫，有许多也是六趾猫。据工作人员介绍，海明威一家曾经

海明威故居的猫

万兴坤

